

Doi:10.11835/j.issn.1008-5831.rw.2026.03.001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陈思覃.“非常”中的日常:红军长征的行军生活与组织运转[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2):  
181-196. Doi:10.11835/j.issn.1008-5831.rw.2026.03.001.



**Citation Format:** Chen Sitan. The everyday in the extraordinary: The marching life and organizational operations of the Red Army's Long March[J].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6 (2): 181-196. Doi: 10.11835/j.issn.1008-5831.  
rw.2026.03.001.

# “非常”中的日常:红军长征 的行军生活与组织运转

陈思覃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北京 100084)

**摘要:**红军长征时期的行军生活,是在一个“非常”历史阶段中构建并维系日常秩序的过程。面对重重困难,红军对外需应对敌人的持续围追堵截与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对内则须克服物资匮乏、伤病困扰与思想动摇等多重挑战。从红军的人员代谢、物资筹措与信念育成三个方面看,其致力于在持续流动与高度不稳定的“非常”状态下,摸索并确立一套可操作、可延续的生存之道。这些渗透于行军点滴的日常实践,成为极端环境中维系组织运转的关键支撑,也为理解中国共产党革命组织的内在生命力提供了来自日常生活史视角的一种阐释。

**关键词:**红军;长征;行军;日常生活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26)02-0181-16

从宏观历史视角看,作为一次大规模的战略转移,长征在中共党史乃至人类历史上无疑是一种“非常”,而从微观生命经验切入,长征更是一场由无数鲜活个体共同铸就、持续两年之久的日常历程。近年来,学界对于长征的研究不断深入,已经呈现出从宏观政治、军事史向日常生活视角转变的趋势<sup>①</sup>,然而,与方兴未艾的抗战生活史研究相比<sup>②</sup>,现有研究大多重视在长征的艰苦中凸显红军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1&ZD025);上海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伟大建党精神与党的精神谱系研究”(2023ZSW002)

**作者简介:**陈思覃,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①相关研究主要包括:邵雍《长征中的女红军》,《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阳勇、杨娟《长征中〈红星〉报与卫生工作之历史考察》,《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阳勇《长征中〈红星〉报与巩固部队工作之历史考察》,《东岳论丛》,2022年第9期;张敏《为革命而歌:红军长征时期的革命歌谣研究》,《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6期;杨东《“胜利在脚”:红军山地夜路行军力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25年第1期。

②相关研究主要包括:吴敏超《绍兴沦陷:战时的前线与日常》,《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5期;任伟《〈杨思一日记〉中的中共游击队战斗生活》,《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9期;宋弘《全面抗战时期华北八路军士兵的日常卫生》,《抗日战争研究》,2019年第1期;黄道炫《“二八五团”下的心灵史——战时中共干部的婚恋管控》,《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1期;吴敏超《苏南反“清乡”:中共干部汪大铭的作战与生活》,《史学月刊》,2019年第6期;黄道炫《中共抗日根据地的日常生活》,《抗日战争研究》,2020年第1期;宋弘《思乡:战时华北根据地士兵的家庭观念(1937—1949)》,《开放时代》,2023年第2期。

的革命精神,对于这支队伍在极限环境下如何通过一套行之有效的日常实践,实现人员、物资与信念的持续再生产,仍缺乏深入揭示。本文认为,红军行军生活的本质,在于其成功地将“非常”状态的生存危机,转化为一套可操作、可重复的日常管理秩序。有鉴于此,本文将结合日记、口述、报刊、档案等史料,力图以“行军”为主轴,串联起长征途中的日常生活实践,并透过这些细微实践,印证红军在极端环境下维系组织运转的内在逻辑。

## 一、“非常”中的生存挑战

长征的“非常”之处,绝非“行军艰苦”四字所能全面涵盖。它在行军进程、组织内部以及生活节律这三个层面同时施加压力<sup>③</sup>,无孔不入地考验着个体的生理与心理极限。

长征的“非常”特质,最直接地体现为行军进程本身的极端困难,而这种困难首先又呈现为超乎想象的行军强度。1935年4月30日,童小鹏<sup>④</sup>在日记中写道:“是月共休息二天,行军28天,行程约1870里”<sup>[1]801</sup>,这意味着平均每日行军超过六十里,且几乎全月无休。李德<sup>⑤</sup>回忆:“疲劳现象在队伍中急剧增加……如果我们白天在一个村子或场院里睡觉,附近落下炸弹,我也根本不会醒来,即使炮弹在旁边爆炸,我也只是翻身再睡。”<sup>[2]141</sup>在这样的生活里,那些不需行军的短暂日子反倒令人印象深刻。何涤宙<sup>⑥</sup>抵达延安后,仍对遵义十天的休整念念不忘,正是因为“这十天中没有行军的事,没有打仗的事……是一年另一个月的长征生活中一段特殊生活”<sup>[3]</sup>。在上述比对中,行军的“非常”愈发凸显。可以说,行军不仅是针对身体的考验,更成为一种深刻的生命体验。

行军之难,同样源于恶劣的外部环境。为了避敌耳目,部队常放弃大道,穿行于山间小径。小路崎岖难行,险象环生,“差不多每个人都摔过几跤”<sup>[4]</sup>。渡河之难更为突出,船只大多已被预先藏匿或销毁。1935年4月,龙云即电示会泽县县长,称“(船只)仅予收藏,难免不被搜获,如匪窜至会泽时应即将船只全部设法销毁,以免资敌”<sup>⑦</sup>。在船只紧缺的背景下,一些日常用品也有了新的用途。陈国辉<sup>⑧</sup>等人为了秘密渡过赤水河,干脆“抬着一个向当地老百姓借来的杀猪用的大木盆,悄悄地下了水”<sup>[5]118</sup>。红军途经四川中部的青衣江时,竟将竹排没入水中,建成“水下桥”,以防对手察觉<sup>[6]152-153</sup>。当部队踏入雪山草地,挑战骤然加剧,直抵生存极限。1936年7月21日,张子意<sup>⑨</sup>在日记中写道:“连日天雨,粮缺,帐棚少,掉队死亡现象极严重。”<sup>[7]</sup>张震<sup>⑩</sup>过草地时的回忆则更为触目惊心:“后续部队无需向导,沿着一具又一具战友的尸体,就能找到前边的部队,到达宿营地。”<sup>[8]</sup>这寥寥数语,足以揭示当时红军所处环境的极端性。

行军本身已然考验着红军的生存,而庞大的组织规模则带来了另一种“非常”。部队在狭窄的生存通道中艰难前行,外部压力被转化为内部的持续消耗,成为日常摩擦与资源争夺的诱因之一。

③ 仍然存在其他层面,但上述三个层面是最为主要的。

④ 童小鹏(1914—2007),福建长汀人,长征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秘书。

⑤ 李德(1900—1974),原名奥托·布劳恩(Otto Braun),德国籍,系共产国际派驻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

⑥ 何涤宙(1908—1942),浙江临海人,长征时期任红军大学工兵教员。

⑦ 《云南总司令龙云关于告知如红军窜至会泽时应即将船只全部销毁给云南省巧家汤县长的急电》,1935年4月23日,1106-003-00017-042,云南省档案馆藏。

⑧ 陈国辉在长征时期的具体情况及职务不详。

⑨ 张子意(1904—1981),湖南醴陵人,长征时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和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

⑩ 张震(1914—2015),湖南平江人,长征时期历任红三军团第4师第10团作战参谋、第3营营长、团管理主任等职,后任红一军团第4师第12团参谋长。

多支队伍并行时,往往互相穿插,引起诸多混乱。赵镛<sup>①</sup>写道:“众多的部队拥挤在公路上,假如某个部队想休息片刻,或坐下来,喝点水、吃点东西,后面跟进的部队就马上插到你的前面去了。”<sup>[9]156-157</sup>莫休<sup>②</sup>直言:“大家都想拣没有障碍的路间走,而障碍又偏偏不断的出现,于是纠纷是来了,我碰了你的手,他踏了他的脚……为了抢路,大家成天挂在嘴皮上的‘同志’两个字也不用了,简直挚爱变成了仇视。”<sup>[10]375</sup>这种拥挤对殿后的部队尤为不利。裴周玉<sup>③</sup>所在的教导师负重行军,所以总是落于人后,“即使遇到有粮食的地方,粮食也早已叫前面的部队买走了,我们只得饿肚了”<sup>[11]133</sup>。

对安全休憩或者充足给养的渴望,可谓人人皆然。所以,裴周玉遇到的这类资源困境,往往成为冲突的导火索。廖汉生<sup>④</sup>回忆,6师18团与17师50团曾因宿营地发生争执,因为这两个团“凑巧把宿营地定在一个地方”“人多房少,双方各不相让,于是争吵起来”<sup>[12]209</sup>。过草地时,6师把粮食让给直属队,结果“部队中出现埋怨情绪,甚至有人把这一连串挫折都归咎于当初的让粮”<sup>[12]209</sup>。林伯渠亦在日记中记载了一次物资分发引起的争执:1935年10月8日,本处为分配事与工作团口角<sup>[13]24</sup>。物资短缺之下,人与人甚至各单位之间的矛盾,长期冲击着红军的组织能力。

如果说与天地的搏斗、与人海的纠缠是有形的挑战,那么长征中更深层的“非常”之处,则在于生活的彻底失序。行军路上,一切确定性被连根拔起,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每时每刻的“不确定”。这从更本质的层面侵蚀着个体的生理与心理防线。

在这些生活失序中,最为突出的是时空秩序的紊乱。红军终日行军,时常天未亮即启程,日落西山仍不休息。形势紧张时,夜行军成为快速机动中熟悉的日常,白天行军反而成为奢侈。1934年11月,赵镛在日记中提到,“(部队)于晨7时许才出发。象这样白天行军,已多日没能享受到了”<sup>[9]142</sup>。然而,夜间行军同样潜藏着巨大风险。对于战士个人而言,“步子稍慢一下,前面火光走远了,就叫你有简直不敢举步的危险”<sup>[10]379</sup>。部队强渡泸定桥时,王耀南<sup>⑤</sup>注意到“河对岸也出现了徐徐蠕动的火把”,情势一时不明。直到“号手们先采用敌人杨森部队的号谱吹了一遍。对方一答,才知道不是我们的红一团,而是敌人增援泸定桥的部队”<sup>[6]146</sup>。可见,在信息不明朗的夜间环境中,无论个人还是集体,每一步判断都命运攸关。

与时空秩序紊乱相伴的,是个人生活节律的破碎。张朝满回忆,红军过金沙江时无暇用餐,因此“在路边熬稀饭……每个战士到那里都自觉地在自己的米袋里倒一把米在簸中,凑起来熬稀饭让后面来的红军吃”<sup>⑥</sup>(图1)。

即便部队获得休整机会,也总是短暂且易被打断。1934年11月17日,赵镛部抵达烂场圩时,“军团首长见此地已远离敌人,中央纵队及军委纵队又在前面行动,故打算在这里休整一两天”,结果刚安顿下来,行军的命令又已传来,“人们匆匆用毛巾把饭一包,便立刻开始了急行军”<sup>[9]161</sup>。在长征的指挥棒下,红军“衣、食、住”的基本需求,始终为“行”所规制与挤占,被切割成行军过程中的碎片。

生活的失序还体现在险境的常态化。长征路上,对手的轰炸与追击终日不绝,成为红军无法回

① 赵镛(1899—1992),云南宾川人,长征时任红九军团供给部部长。

② 莫休,据刘统考考证即徐梦秋(1901—1976),安徽寿县人,长征时历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宣传部长。

③ 裴周玉(1912—2015),湖南平江人,长征时历任中央教导师特派员、红三军团政治保卫局检查科科长等。

④ 廖汉生(1911—2006),湖南桑植人,长征时任红二军团第六师政治委员。

⑤ 王耀南(1911—1984),江西萍乡人,长征时任军委工兵营营长。

⑥ 张朝满(住绥平上平子村,61岁)的口述材料,1975年1月13日,周朝举主编《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集),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609页。

避的生死威胁。1934年12月,国民党军“在土岗岭、两渡桥等处投弹数十枚”,造成严重伤亡的同时,散发劝降传单数万份<sup>①</sup>。可见飞机不仅具有杀伤威力,更被赋予了心理战的功能。据金震宇<sup>②</sup>回忆,红军二过遵义时,敌机先后两次空投劝降材料。首次投下的传单以“跟着朱毛走,不是拖死,便是打死”等煽动性语句进行恐吓,并以“拖枪来降者,每支奖洋伍佰元”等内容实施利诱<sup>[14]142</sup>。第二次则散发了署名“孔荷宠”的劝降书,自称“弃暗投明”,“叫民众不要参加共产党”<sup>[14]142</sup>。在轰炸与追击的阴影下,红军的警戒与转移几无休止。1935年4月23日,陈伯钧<sup>③</sup>所在的队伍经过沙寨时,前脚遭到轰炸,追兵又接踵而至,部队最终只得“在沙寨以战备姿势布置宿营”<sup>[15]105</sup>,连片刻的喘息都仿佛成为奢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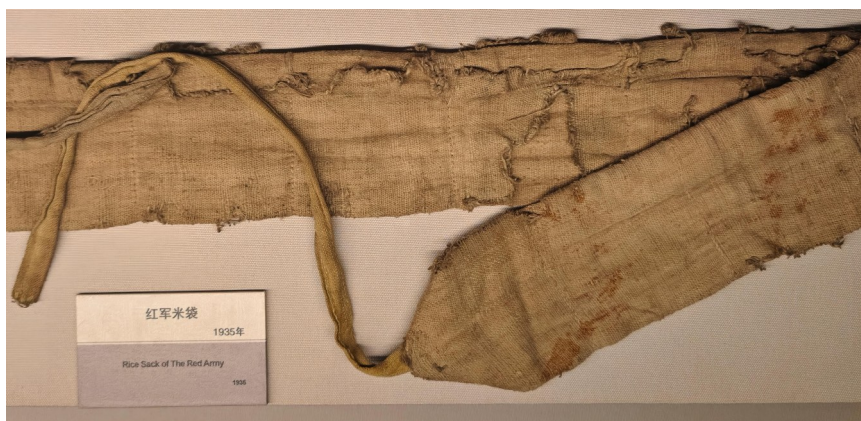


图1 红军米袋和行军锅

注:云南省博物馆展陈之藏品

在行军进程、组织内部以及生活节律同时遭受冲击的背景下,面对茫茫前路与每日上升的伤亡数字,人们对前途感到迷茫实属常态。1935年初,陈伯钧便在日记中流露出难以掩饰的苦闷:“这些血汗所换得的究竟是什么?真是不堪设想!午夜静思,能不泪下!……可怜我大好男儿,岁月就这样逝去……”<sup>[15]171</sup>高级干部尚且如此,普通士兵中动摇和思归的情绪便更为滋长。被俘红军陈仲泉在口供中坦言:“其实匪中已拾获官军之传单,知官军只拿匪首,不问匪兵。军心非常摇动。只要

① 《第一军团刘建绪昨率部队进抵武冈》,《大公报》(长沙),1934年12月8日。

② 金震宇的具体情况不详,据其自述,他当时是一个失了学的中学生,以“躲而不避,观其所以”的心态旁观了红军的一切。

③ 陈伯钧(1910—1974),湖南醴陵人,长征时期历任红五军团第十三师师长、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参谋长等职。

有机,便想反正投诚。”<sup>②</sup>这段供词固然不可尽信,但也从侧面反映出红军内部的动摇情绪。

陈伯钧在回顾1934年时写道:“轰轰烈烈的、炮火连天的1934年在行军中结束了!这一年其事之繁,为片简尺幅所不能记录也。”<sup>[15]74</sup>这句话可谓当时变动不居行军现实的生动写照。其实,陈伯钧所谓“其事之繁”,恰恰揭示了长征途中“非常”状态的本质特征,即红军必须在持续的不确定性中,应对层出不穷的突发状况。在这种“非常”的状况下,红军要如何维持其组织运转,成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其减员如何补充?物资又从何而来?更为根本的是,究竟凭借什么,才能维系队伍不散?

## 二、“非常”中的人员代谢

在常规军事行动中,部队的兵员损耗常常能清晰计算,其补充亦遵循明确的周期与计划。然而,在长征行军途中,个体的动摇、负伤、疾病乃至最终的退出,则成了庞大且持续的伴随现象,面对这种“非常”局面,如何在流动中不断进行人员代谢与补充、在“去”与“来”之间维持这支革命队伍的生命力,便成为与“行军”本身同等重要的日常课题。

掉队,是人员代谢中“去”的主要形式,行军疲劳与生理失能是其主要推手。连续的行军,对体能构成了严峻的考验。一般单日行军距离越长、路越难走,掉队的战士数量也就越多。1935年2月27日,林伟<sup>③</sup>部“行军160里,连续走了一天两夜”,即便是对于以坚韧著称的红军而言,这种强度也超过寻常,其结果就是“掉队者达400余人”<sup>[16]</sup>。反之,一旦行军强度稍减,情况往往能有所好转。1935年7月6日,萧锋<sup>④</sup>担任收容工作,发现“这几天比较轻松,掉队的少了”<sup>[17]96</sup>。同时,伤病与劳损也是战士无法继续行军的重要因素。据廖汉生回忆,“在长征中,指战员们最担心负伤”,因为伤势轻重决定了能否跟上行军;而能否跟上行军,则决定了个人去留。“一旦负了伤,轻伤者,跟着部队走;重伤者,能快愈的用马匹、担架运起走,一时难愈的只得寄留在沿途老百姓家里。”<sup>[12]202</sup>李坚真<sup>⑤</sup>提到,当时担架员数量有限,“不是谁病了都可以坐担架的,不然这支部队就很难开进”<sup>[18]92</sup>。马匹同样如此,“红军有些马,但大多是驮东西的,人骑的很少”<sup>⑥</sup>。换言之,资源必须倾斜给有希望走下去的人。陈国辉回忆,在草地时,“有的战士只好赤脚行军,脚底板被扎出许多大大小小的眼子,在稀泥里一搅,污水里一泡,一双脚板肿得就像两个大萝卜”,面对这种大量负伤的状况,部队也无力回天,只能任凭“掉队的一天比一天多起来”<sup>[5]121</sup>。

除了生理失能,还有一种更为深层的掉队原因是心理上的退却。陈国辉曾撞见一名打算“开小差”的战士,面对劝阻,对方抱怨道:“听说那草地荒无人烟,漫无边际,没吃的,没穿的,我们能走得过去吗?万一在草地死了,连家里的人都不知道,那样死去太不值得了。”<sup>[5]121</sup>不难想见,此时人心的动摇以及随之而来的逃避,已成为影响部队战斗力的严峻现实问题。

无论因伤病不得不脱离队伍,还是因信念动摇蓄意离队,部队不会因掉队者而延缓行军步伐。一旦战士掉队,他们的命运轨迹便与主力部队彻底分离。红军流动作战,与地方的接触是短暂的,掉队的后果往往非常现实。“红军走后,地主民团来了。到处捕杀掉队的红军伤病员”<sup>⑦</sup>成为一种常

<sup>②</sup>《龙总司令纵谈剿匪军事》,《云南日报》1935年5月4日第6版。这段供词是龙云在接受采访时转述的。

<sup>③</sup>林伟(1914—1979),福建武平人,长征时任红九军团司令部参谋处测绘员。

<sup>④</sup>萧锋(1916—1991),江西泰和人,长征时任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三团政治委员。

<sup>⑤</sup>李坚真(1907—1992),广东丰顺人,长征时期先后担任军委第二纵队政治部民运科科长和干部休养连政治指导员。

<sup>⑥</sup>杨再锦(地茶村村民)的口述材料,《红军长征纪实丛书:沿途亲历者忆长征卷(1)》,第453页。

<sup>⑦</sup>廖秀甫(全州县两合乡田村农民)的口述材料,1985年,《红军长征纪实丛书:沿途亲历者忆长征卷(1)》,第26页。

见的情况。这种报复并不仅针对掉队者本身,凡与红军有过接触者,皆可能招致悲惨后果。例如,红军途经贞丰时,曾发动群众斗争地主王海山,待队伍离开,积极分子韦阿固旋即遭到报复,家中被抄,“死后也没人敢去安葬,尸体就那样一直摆着”<sup>②6</sup>。此类记载揭示,掉队者面临的危险不仅来自伤病,更来自红军身后的清算。

事实上,即使幸而没有被捕遇害,掉队的战士依然面临不可预测的命运走向。来自浙江金华的黄志明曾随兄长参加红军,之后自述“脱离革命是想回家去”,然而途经江西时被国民党军队强征入伍,直至贵州瓮安才得以逃脱,至新中国成立后仍滞留当地<sup>②7</sup>。湖南桂东的李自仁因伤重留在中央苏区,身上一文钱都没有,便“混入白军第一军一师一团在九连当新兵”,分得小洋1元2毛后又“开小差”跑掉了<sup>②8</sup>。无怪乎李坚真回忆:“到了延安,中央派人去找伤员,多数都没有找到。”<sup>[18]98</sup>毕竟,他们往往早已被卷入不可控的社会动荡中。

面对持续的人员损失,红军力图进行应对。虽然掉队现象难以完全避免,但通过建立“收容”机制,红军得以挽救处于掉队边缘的战士。这一机制的核心,是组织专门队伍殿后,全力协助落伍者归队。1934年11月12日,彭绍辉<sup>②9</sup>过百丈岭时,两支部队混在一起,都“低着头拼命走,拥挤,混乱,深夜才到文明司。行程近百里,疲劳不堪,掉队者非常严重”,因此“全师所有骡马都留在后面。以收容掉队人员”<sup>[19]316</sup>。收容队通过减轻负重,最大限度地维持掉队者的行军能力。裴周玉当时是一支收容队的负责人,他回忆“收容队的最大享受就是不背包袱,也不背枪,大家互相搀扶着走路,实在不能走路的骑在马上”<sup>[11]133</sup>。收容队还尽量保证医疗条件,彭绍辉部的收容队即“备有药品与牲口”<sup>[19]316</sup>。李坚真回忆,她曾两次受益于收容制度:一次坠入深坑,被收容队用绑腿拉上来;又一次因腹泻掉队,被收容队一路架到宿营地<sup>[18]98</sup>。“收容”制度的存在,意味着“掉队”并不等同于“放弃”。红军通过这一措施,将挽救战士并维持部队规模的努力,变成了贯穿行军始终的“日常”工作。

相较于对内减少损耗的“收容”,向外“扩红”则开辟了组织代谢的“入口”。正如聂荣臻所言:“部队也不能伤亡一个少一个,总要千方百计地动员群众参加红军。从道理上说,哪里有穷人,哪里就有兵源。”<sup>[20]</sup>行军造成队伍不断减员,却也赋予队伍不断吸收新兵的机会。为了“扩红”,每至一地,红军都力图营造浓厚的革命氛围。李安得回忆道:

甲戌年古历十一月初八,红军来到剑河县城,在现在的县人委会院内(过去的学校)召开过三天群众大会……那时满街都写得有标语、口号,还教小孩们唱歌!我还记得两句:“打土豪、劣绅,我们同志好安宁,我们工农红军是大救星……”<sup>③0</sup>

锦屏县侗族青年杨和钧便是被红军标语感召的一人。杨和钧小时候读过私塾,有文化,曾参与救治红军伤员,后欲追寻红军,最终遇害。他在诗歌里写道:“人人的目光都投向板壁上/因为板壁上有农民的指南/这指南是红军留下的宣传标语/它召唤穷苦农民站起来/打倒土豪劣绅分田地夺政权/扛起枪把东洋鬼子赶下海洋。”<sup>③1</sup>诗歌抄本如图2所示。

<sup>②6</sup> 韦连明(韦阿固的亲弟弟,男,1916年生,布依族)的口述材料,《贞丰县关于中国工农红军等的情况调查报告附件》,1998年3月15日,贞丰县史志办藏。

<sup>②7</sup> 《贵州省贵阳专区瓮安县红军调查表》,1952年7月16日,24-1-7,瓮安县档案史志馆藏。

<sup>②8</sup> 《一九三七年寨前乡槐树村李鸣凤自传及书信》,1937—1969年,0001-WS-001-1937-0008,桂东县档案馆藏。

<sup>②9</sup> 彭绍辉(1906—1978),湖南湘潭人,长征时期历任红一军团司令部教育科科长、红三军团教导营营长、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参谋长、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团参谋长等职。

<sup>③0</sup> 《中共黔东南自治州委员会办公室红军长征资料》,剑河部分第6页,无编号,黔东南州档案馆藏。

<sup>③1</sup> 杨和钧《板壁上的指南》(抄本),遵义会议纪念馆展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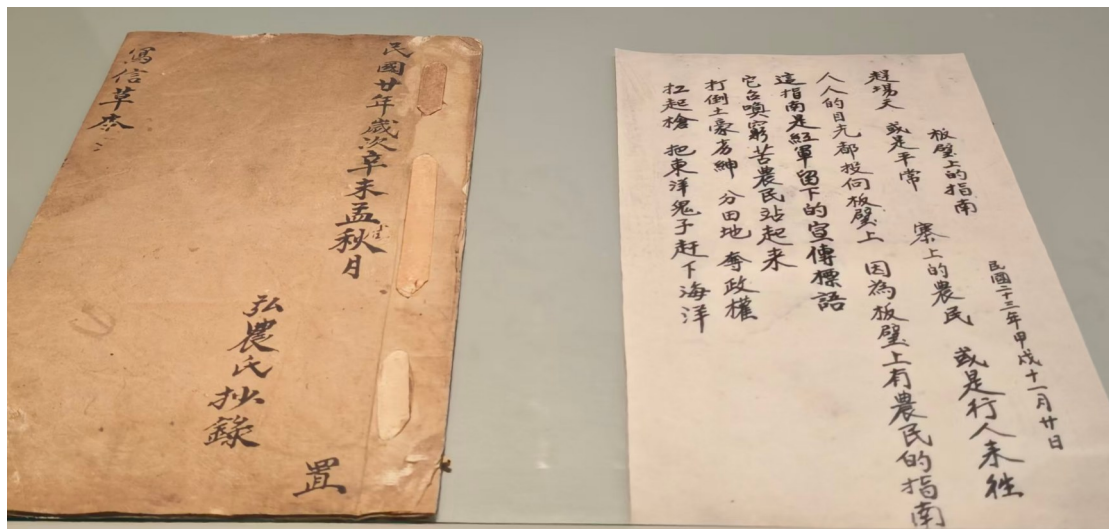


图2 杨和钧《板壁上的指南》抄本

杨和钧诗中提及的“打土豪”等口号并非空谈,而是被红军切实转化为“主持公道”的实际行动,甚至吸引群众主动向红军求助。彭雪枫记得,过娄山关时,一位“上半截披的像棉袄,下半截烂了裤的汉子”拦路控诉劣绅逼妻夺女之冤,令他不禁感叹:“包文正大人常常干的那一套,居然今日重演了!”<sup>②</sup>获得底层民众的同情与支持后,兵源问题便不是难事。1935年5月4日,赵镛在日记中写道,在枪决土豪劣绅、焚烧契约、分发粮食之后,“人民群众无不称快,当即有300多人报名参加红军”<sup>[9]287</sup>。甚至出现了一面收留伤员,一面出人当兵的模范家庭<sup>③</sup>。

然而,新兵的大量涌入,有时也带来挑战。这些新兵难以立即形成战力,老红军李金奇回忆,他们这批新兵在云南寻甸入伍,“进入四川才被编入老兵连,过金沙江后才发枪给我们”<sup>④</sup>。究其原因,在生活习惯方面,新兵带有很多陋习。李德回忆,在那些暂时招来的脚夫和被编入部队的志愿者中,不少人已经嗜烟成习,红军不得已作出让步,允许他们多少抽一点<sup>[2]141</sup>,并为戒烟长期“留新兵连训练”<sup>⑤</sup>。在体能适应方面,许多新兵难以承受行军的艰苦。1934年11月21日,萧锋抱怨:“道路泥泞难走,掉队很多,尤其是新战士,他们缺乏锻炼,体力不行。”<sup>[17]17</sup>在实战经验方面,新兵也最为缺乏。1936年10月,陈伯钧所部遭轰炸,“我军伤亡约50人,以杂务工作人员和新战士为最多”<sup>[15]263-264</sup>。

新兵表现不尽如人意,除了上述客观原因,同样可以从其主观动机的复杂性中寻找解释。萧锋在日记中记载,有些人将加入红军视作生路和出路,“这里的人穷得没有饭吃,积极要求当红军”<sup>[17]80</sup>。有的“因父母被反动派杀害,要为父母报仇”;有的为摆脱压迫性的家庭安排,“为了逃婚”;还有人自认别无选择,“不当红军也得被国民党抓去当炮灰”<sup>[17]17</sup>。这些各不相同的入伍动机,导致新兵对革命事业的认同感和战斗意志参差不齐。“红军之友社”在遵义动员的失败,便揭示了将一般的同情者转化为坚定战士是何等困难:1935年1月,红军在遵义休整期间,70多名男女青年结成该社,协助红军开展宣传和救济工作。然而当部队开拔时,仅有李小侠等少数几人最终愿意随军出

② 彭雪枫(1907—1944),河南镇平人,长征期间历任红五师师长、红十三团团团长。《娄山关前后》,《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第349页。

③ 翰文《扩大红军》,《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第391-392页。谢翰文(1904—1942),湖南耒阳人,长征时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④ 《老红军李金奇自述(马金荣整理)》,84-1-64-020-029,寻甸县档案馆藏。

⑤ 《军委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贵州社会科学》编辑部、贵州省博物馆编《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内部资料1983年印,第65页。

发<sup>[21]</sup>。值得注意的是,李小侠早在1934年就接触进步书籍,组织共产主义小组<sup>⑥</sup>,其革命意志较为坚定,这或许是她能够随军出发的最大原因。

部分新兵加入红军是出于一时热情,但他们很快发现这意味着与平静生活彻底割席。一旦初始热情消退,动摇与退缩便成为普遍现象。可以说,新兵往往是其中“主力”。例如,1936年4月,在楚雄牟定县的张元冲(地名),有七位同乡一起加入红军,但其中四人到姚安后即返家,未出云南省境<sup>⑦</sup>。在此背景下,干部在扩红中变得谨慎,也更倾向于带经验丰富的老兵。1934年底,剑河村民杨德安受到鼓动后,“要求同红军去,那个排长说:你不要去,你家里有孩子”<sup>⑧</sup>。1935年12月19日,萧锋在日记里写道:“全团有参加过长征的同志一百八十五人,陕北籍新兵三百二十五人,共五百十人……我接受任务时,感到新兵多,有点发愁。”<sup>[17]142-143</sup>

不过,尽管面临诸多现实挑战,仍有优秀战士在磨炼中迅速成长。几个月前还在为新兵犯愁的萧锋,于1936年3月10日在日记中写道:“晨,派一连向南阳方向侦察敌情,他们刚到南阳,遇敌便衣队四十余人,被我军击溃,缴枪十余支。一连虽然新兵多,但打仗很勇敢。有这样的好战士,我感到很高兴。”<sup>[17]148</sup>从新兵到老兵的蜕变,是战士必然要经历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本身就是长征行军所带来的自然筛选。

总体而言,红军在行军中面临着人员日常流失的“非常”局面,并力图在其中构建起一种动态的代谢秩序。1935年4月19日,萧锋在日记中写道:“有三人掉队,但又扩红五人。”<sup>[17]67</sup>作为干部,萧锋对这种小事印象深刻,其实颇耐人寻味。这说明,每名干部心里都在算一笔人员流动的账。长期来看,只要人员流失与补充同步,减员速度则相对可控。因此,掉队、收容与扩红三者之间形成的动态平衡,成为维持部队规模的重要方式,它成功地将“非常”的生存危机,纳入了“日常”的管理轨道,进而帮助红军在行军中维持组织生命。

### 三、“非常”中的物资取给

无论是减少非战斗减员,还是巩固新扩红的战士,都离不开最基本的物质支撑,而长征却是在无后方、无固定补给的极端状态下展开的漫长行军。面对这一“非常”困境,红军发展出了一套以“就地取给”为原则,以“资源导向、轻装求生、争取群众”为具体对策的流动生存策略。漫长的行军塑造了红军独特的物资取舍逻辑,而物资的取舍同样深刻影响着行军节奏、士兵士气乃至战略抉择。

在人口较为密集的地区,红军严格遵循“就地取给”的原则。行军路线所经之地,尤其是地主土豪集中的区域,便成了重要的补给站。薄复礼<sup>⑨</sup>观察到,“他们(指红军)的一切补给都是靠夺取。有一次,我们来到一个地主家宿营,这里的一切,立刻成了红军的财富。他们拿走了一切用得着的东西”<sup>[22]86</sup>。行军时间紧迫,无从调查研究,红军的判断大多也简单而迅速。薄复礼曾经问战士:“农民与地主的界限你们是如何划分的?”答曰:“按自食其力。如果一个人的土地由他人来耕种,那他就是压迫者。”<sup>[22]86</sup>

⑥《李小侠座谈记录》,《关于落实地下党组织的情况》,78-12-15,湄潭县档案馆藏。

⑦《红军长征过楚雄州参军人员情况表》,中共楚雄州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红军长征过楚雄》,1987年版,第324页。

⑧《中共黔东南自治州委员会办公室红军长征资料》,剑河部分第6页,无编号,黔东南州档案馆藏。

⑨薄复礼(Rudolf Alfred Bosshardt, 1897—1993),瑞士籍英国传教士。1934年10月1日传教途中被红六军团扣押,1936年4月12日获释。

面对紧迫的资金需求,红军就地取给之际,必须采取以资源为导向的行为模式。1935年2月20日,《总政治部关于保障红军给养与克服战费困难的训令》特别强调了事先侦察的重要性,指出应“事前在群众中详细调查该土豪的家产”<sup>⑩</sup>,以使心中有数。这样一来,对于征集不到多少财物的地方,就能及时予以规避。红军到榕江后,曾向村民杨通祥调查村寨情况,得知“仅有我们四五户人家在那里种田”后,“就不再问了”<sup>⑪</sup>。

对于地主、土豪,红军不仅注重对一般财产的没收,更强调对藏匿财产的深挖。1934年12月,《红星》报动员战士积极参与“挖窖”工作,并举例称:“一营机关枪排挖窖得大洋二百四十余元……八连挖窖得大洋九十余元。”<sup>⑫</sup>当月,红军路过柳霁时,尽管县长将“军米……以及行囊、公物、文件等,均藏于空房夹壁之内”,依旧“损失罄尽”<sup>⑬</sup>。可见红军排查物资时何等细致。事实上,为了最充分地获得补给,红军没收家产之外,往往还要追加一笔罚款。如在对地主周炳其的处理中,除了“家产全部没收分发给本地工农群众外”,还附带“罚款大洋一千元”<sup>⑭</sup>。

羁押犯人以换取物资,亦是特殊条件下的补给手段之一。1935年5月17日,《云南民国日报》报道,红军离开会泽后“捆去男女数十人,有款者追匪取赎”<sup>⑮</sup>。实际上,相较于实施惩罚,红军更希望家属能尽快支付赎金。一位红军法官曾直截了当地问薄复礼:“你们打算继续服刑还是赶快交来赎金?”在被告知无力支付后,法官说:“那只好服刑,但我们不能给你像逃跑前的那么多自由了。”<sup>[22]101</sup>几天后,薄复礼按红军要求写的信件被送出,“信中说,红军现在需要高射机枪,并且务必于3月15日前交来;此外,还要赎金及大量西药,交这些钱和药品的最后期限是4月14日”<sup>[22]109</sup>。由此可见,红军一切动作的最终指向,皆为获取急需的现金和物资。而“高效利用”策略的实质,也正是将行军路线上可以获得的资源最大化,在“非常”的转战中维持基本的日常所需。

为适应高强度的机动行军,红军确立了轻装快进的生存法则。在物品的选择上,物尽其用成为取舍标准,每一件保留的物品都必须具备明确的用途。武定县县长杜宗琼观察到,红军“仅要银钱及轻便之贵重物品,其他衣服什物,指使地方无赖自取,以表示将有的分与无的”<sup>⑯</sup>。赵镛曾“派了一些同志出去收集破碎衣物”,这些在常人眼中无用的废弃物,却被红军视若珍宝,“分给大家打草鞋用”<sup>[9]408</sup>(图3)。1936年3月23日,《云南民国日报》亦援引所谓“灾民”的说法称,妇女素日所用的裹脚布被翻箱倒柜抢去,或做腰带之用,或打草鞋<sup>⑰</sup>。

为了保障行军速度,主动减负并不罕见。赵镛记载,离开苏区后,“沿途有土豪可打,故将从苏区担来的食盐、大米大部分发给了沿途的穷人”,此举使供给部“减轻了400多担,行军就轻便多了”<sup>[9]137</sup>。极端情况下,不仅是粮食,连金钱都是可以舍弃的对象。红军过金沙江时,“烟土、银元都丢到山沟里去了”<sup>⑱</sup>。可见,物资补给固然需要分秒必争,但其一切努力都不得不服从于行军本身这一最重要的军事行动。

⑩《总政治部关于保障红军给养与克服战费困难的训令》,《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第71页。

⑪杨通祥(八十岁,汉族)的口述材料,中共榕江县委党史办公室编《红军进榕江》,1986年版,第77页。

⑫《努力筹款工作!行团的挖窖潮》,载于《红星》1934年12月总第6期第3版。

⑬《柳霁分县县长呈报……经过路线》,《红军长征在锦屏》,锦屏县档案馆、锦屏县地方志办公室2021年编印,第195页。

⑭《中国工农红军“河南”政治部布告》,《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第59页。

⑮《云南民国日报》,1935年5月17日第6版。

⑯参见《武定县长杜宗琼函》。

⑰《云南民国日报》,1936年3月23日第3版。

⑱《田维扬同志谈话记录》,《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第190页。田维扬(1906—1977),湖北枣阳人,长征时在红三军团担任营长。



图3 有布条加固痕迹的草鞋(复制品)

注:云南柯渡镇红军长征纪念馆藏品,编号2078

在筹集物资的同时争取群众,既是革命理念的实践,也是争取民心、为后续寄留伤员和扩红创造条件的生存策略。首先,形式上的买卖公平成为原则。例如,途经楚雄期间,红军用于交换的物品即包括衣服、菜刀、小钟、棉絮等各类物资<sup>④</sup>,其价值未必真正相等,而是展现出“有什么给什么”的务实作风。然而,红军的公平并非无差别。1934年12月,红军经过高顿上少寨时引起火灾,农民韩济忠和袁瑞庭都表示,赔偿时穷人损失少,赔得多;有钱人损失多(一二百担谷子),赔得少(一二十担)<sup>⑤</sup>。同样,当红军渡过金沙江、毁船阻敌之际,他们询问船家:“船是你们自己的,还是地主的?”若属地主,则不予赔偿;若属穷人,则一律赔偿<sup>⑥</sup>。这种基于阶级身份的差别化处理,在争取底层民众配合的同时,又在物资极度紧缺的情况下对支出有所控制。

其次,瓜分土豪物资也是拉近群众距离的重要手段。小朋回忆,群众苦土豪久矣,一听说分东西,“从各家各户一致争先恐后的向那个土豪家里去了。顿时满街上挤得人山人海,一下子一批一批的群众从土豪家里拿了东西出来了”<sup>[23]</sup>。在国民党的宣传致使群众存有顾虑的背景下,此举成为打破隔阂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彭绍辉直言:“我军的这些做法给群众留下了好的印象,后来群众宣传开了,说这个军队是好人。”<sup>[19]325</sup>

然而,这种“就地取给”的策略同样存在其局限性,即高度依赖当地的经济状况。在有人烟的地区,红军的大部分物资困难尚能设法解决,最大的困扰无非是某些品类的稀缺。正如加伦<sup>⑦</sup>所指出的,“久在敌人封锁包围中奋斗的战士们,虽然过去一般的物质上没有受到多大的困难,但是许多东

④ 《文物统计表》,中共楚雄州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红军长征过楚雄》,第350-354页。

⑤ 《中共黔东南自治州委员会办公室红军长征资料》,黎平部分第4页,无编号,黔东南州档案馆藏。

⑥ 张朝满(住绥平上平子村,61岁)的口述材料,1975年1月13日,《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1609页。

⑦ 彭加伦(1906—1970),江西奉新人,长征时期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科长。

西却难买到”<sup>[24]</sup>。然而,当行军路线进一步深入人烟稀少的地区,这套补给方式便无法继续。裴周玉回忆,“深山老林,没有人烟,没有村庄,有时几天也见不到一个人家……在这种地方即使有钱也无处去买粮”<sup>[11]133</sup>。

“就地取给”的策略一旦失效,红军的物资补给就退回到朝不保夕的状态。1935年7月17日,林伯渠尝试核算其所在纵队需要粮食的数目,“以一千二百人计算,每人日需粮食一斤,计二十天共需两万四千斤,已有粮食三千六百二十斤”<sup>[13]15</sup>。这意味着纵队存粮仅供维持3天,一旦无法及时筹到粮食,就会陷入断粮的境地。于是,筹粮一跃成为极为紧迫的任务,8月7日,林伯渠得知“沙窝会议已告一段落,决议案已通过,仍驻原地整理一时期”。次日便十万火急地开始“预拟第二次筹粮计划”<sup>[13]18</sup>。物资匮乏成为行军生活的绝对背景后,任何对集体资源的侵害都将面临最严厉的惩处。伍云甫<sup>③</sup>日记记载,1935年8月7日,处决罗雄辉、苏占元,因其偷卖煤油<sup>[25]731</sup>;10月23日,处决何书新,因其逃跑兼丢弃器材<sup>[25]740</sup>。

物资匮乏,有时也成为革命情谊的试金石。过草地时,一些饿倒的战士“发现了收容队,忙着捋把草把脸盖住……他们心里十分清楚,收容队也不会有多少粮的,多一张嘴,就意味着多几倍的困难”。有的死者以其最后的奉献致意战友,“赤身裸体,身边却叠放了一堆衣物,路经的战士一一脱帽致哀,他们理解这位死者的夙愿”<sup>[26]</sup>。彭绍辉有病而不愿用马,“我的骑马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虽说军团部有公马,可有时警卫员病了还得骑马,我不能自己占用呀”<sup>[19]336</sup>。然而,物资的紧张也难免引发内部摩擦。一次激烈的冲突便发生在陈伯钧身上,他从九军调往总部时,传令兵“声言奉命不准我带一点东西,只许只身去总部……最后竟动手强搬东西,强拉所有马匹,由五军带来的马匹亦被没收”<sup>[15]160</sup>。陈伯钧随即向上抗议,但直至五天后,这件事情才勉强得到解决,“总政委送一匹无鞍的瘦骡子给我,以解决我失马问题”<sup>[15]162</sup>。但被九军没收的马到底没有要回来。此种争执,反映了在极端的生存压力下,革命队伍之理想主义与其现实需求间的顽韧。

总体而言,红军长征时的物资补给,以沿途的“土豪”为主要对象,力图以一套“就地取给”的日常流程战胜“非常”的匮乏,从而为部队提供基本的物质支撑。它既展现了红军在极端环境下的组织韧性,也暴露了行军依赖地方资源、缺乏稳定后勤的脆弱一面。特别是在雪山草地等特殊地域,这种模式甚至一度失效。童小鹏走出藏区后,重见人烟集市,丝毫不掩饰其欣喜之感:“回想自入金山……至今三个月,过着的是非常的生活,见不到人,没有交易,没有土豪打,今日则完全相反。”以至于感叹道:“今天似乎是另出了一世!”<sup>[1]826</sup>这段日记也从侧面印证了,红军“就地取给”的物资补给模式若能顺利运转,对维持行军生活具有何等关键的作用。

#### 四、“非常”中的信念育成

对红军而言,人员流动与物资短缺是直接现实的挑战,而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则在于如何让战士在心中接受并坚守这种艰苦得超出既有经验的“非常”?被俘红军陈仲山表示,红军“所以尚不完全溃散者,以政治人员宣传维系,及在他乡异地,落伍人员不免被杀”<sup>④</sup>。这一陈述虽点出了政治宣传与外部威胁的作用,却将“不溃散”简单归因于这些条件,未能揭示信念内化的真实过程。正如陈云所述,“试想赤军几年来在这样困难条件之下作战,如果军心不固,则早已失败”<sup>[27]</sup>。在笔者看来,维系

③ 伍云甫(1904—1969),湖南耒阳人,长征时期负责红军的无线电通讯工作。

④ 《龙总司令纵谈剿匪军事》,《云南日报》1935年5月4日第6版。

队伍不散的本质,在于红军通过持续而具体的日常实践,将战士的精神世界锚定于集体秩序之中。

红军致力于在“非常”中打造稳定秩序,以“日常”对抗“非常”带来的迷茫。行军充满了“不确定”,红军的组织生活却力求在流动中打下楔子。从赵镭的日记来看,只要休整,部队就要抓住机会开会:1934年10月31日,“休息待命……我们在篝火旁召开了总支扩大会和各支部的支、组联席会”。11月22日,“大家在毛毛细雨中,围在火堆旁,边烤衣服边开小组会”。至1935年1月5日休整期间,上午各单位召开小组会与班务会,下午则举行支委扩大会及士兵大会;3月1日供给部在板桥召开活动分子会议,参会者达120余人;3月27日饭后休息两小时,各单位也抓紧召开班组会<sup>[9]145,165,204,238,257</sup>。在薄复礼眼中,看守他的战士同样遵循着严格的日常程序:“只要天一黑,看守长就按登记表开始点名,点完名就讲话,唱歌……唱完歌,最后还要自我表白一番。”<sup>[22]91</sup>

除了召开会议,红军的仪式也在塑造集体认同中发挥作用。这些仪式未必规律举行,却必须存在。它们以超越日常的姿态,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日常”。追悼仪式即为其中之一,其形式随条件不同而有所调整,条件允许时,便办得严肃一些。1934年10月24日,作战科副科长郑伦阵亡。此时红军刚出苏区不久,尚有条件为干部举行正式的追悼会。其灵堂设于卫生部驻地正厅,灵牌列明其生平,各部均派代表参加<sup>[9]139-140</sup>。而在条件不允许时,仪式便化繁为简。在草地,只需“脱下八角军帽”便足以举行“一分钟葬礼”<sup>⑤</sup>。庆祝活动亦为红军凝聚士气的重要方式,无论是纪念节日、战役胜利,抑或部队会师,皆可作为集体欢庆的契机。1935年3月初,红军进驻遵义后,更将两者并置,计划在第三中学举行群众大会,庆祝红军的伟大胜利和追悼为革命而牺牲的死难烈士<sup>⑥</sup>。

显然,这些密集的会议与仪式,其功能并不止于事务传达。1934年11月2日,赵镭随第一军团第一师行动,不禁感叹:“该师……伤亡很重,现在恐怕不认识几个人了。今天,只见到了军实科陈科员,他的外号‘老乌龟’,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sup>[9]146</sup>在这种人员快速更替的背景下,战士个体的孤独与疏离可想而知。而集会、仪式将分散的个体以组织的名义重新聚集,对战士的归属感是一种有力的修复。

在日复一日的颠簸中,思乡成为难言的情感底色。1934年11月7日,萧锋在日记中感叹道:“从这打回江西该多好呀!我们……想念家乡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想念无数的江西老俵!”<sup>[17]9</sup>红军战士冷绍清是江西修水县人,长征期间流散至贵州瓮安。新中国成立后,当地政府原计划补助其大米200斤,后用粗笔划掉,在一旁写上“资助还乡”。这一改动,极有可能是他本人强烈请求的结果<sup>⑦</sup>。正是在这种普遍弥漫的乡愁背景下,一个具有象征性的“精神家园”就显得尤为珍贵。薄复礼观察到,“每到一地,不管停留时间长短,‘列宁室’是必建的”(图4)。其因陋就简,“有时利用房子,有时就自己动手临时建,八根竹竿或树杆做柱,绿色的树枝和竹枝编在一起作墙,屋顶铺上稻草就算天花板”<sup>[22]101</sup>。这同样在“非常”中构成了一种简单的确定性。

另一方面,红军也善于将未来的“非常”挑战,转化为当下可学习、可掌握的“日常”课题。1935年1月7日,部队甫一进入湄潭,供给部即发动群众织造衣物,“利用没收的布疋和市面上数十部缝衣机,以自己的缝纫班为主,广泛动员人民群众帮助,日夜赶做棉衣”<sup>[9]208</sup>。四天后,部队扩红成果初现,“经和八、九团联系,他们共扩大新战士近千人,直属队也有200多人”<sup>[9]209</sup>。此番安排,使物资筹

⑤ 王家树《生死关头》,《口述长征》第210页。王家树(1919—2006),四川巴中人,长征时期为红四方面军战士。

⑥ 《举行遵义群众祝捷大会》,《红星》1935年总第11期第3版。

⑦ 《贵州省贵阳专区瓮安县红军调查表》,1952年7月16日,24-1-7,瓮安县档案史志馆藏。

集走在队伍壮大前面,从而在节奏上赢得了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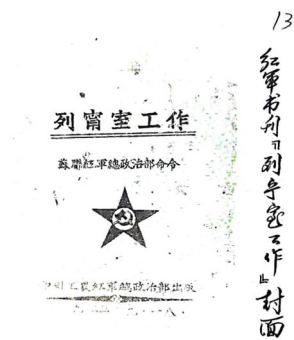


图4 红军遗留在宣威的书刊《列宁室工作》封面

注:云南宣威市档案馆藏,档号 173-0101-011

这种预见性同样体现在红军的经验传承中。借此,红军将前途的未知转化为可以未雨绸缪的课题。1935年6月16日,先头部队过雪山的经验传达到赵镛所在的供给部,其中包括防寒、饱食、携带姜椒、避免中途休息等要点,“供给部及时把这些经验传达到我部各单位,并组织检查小组,细致检查过雪山的各项准备工作。”<sup>[9]317</sup>1936年3月下旬,红四军再度北上前夕,举办了一场“野菜展览会”,其初衷是“指导指战员学会过草地时识别可供食用野菜的知识”,后来又发展成“总结草地生活经验,传布草地生活常识的会”<sup>[28]</sup>。会上“展出了草地上可供人吃的野菜17种,分别给它们起了名字,写明了各种野菜的做法、吃法”,“衣物的展品……有以毛线缝制的棕毛背心;有自吊毛线,自己织成的衣、裤、鞋、袜、绑腿;有用牛皮做的草鞋”<sup>[16]640-641</sup>。彼时隶属于红四军的陈行庚回忆,在山下“还做了必要的规定,要互助扶助……上山不准打枪,不准高声讲话,不要唱歌,唱歌在山这一边或那一边可以唱,所以如此怕影响疲劳,防止气候变化”<sup>⑤</sup>。

然而,再严密的组织秩序和知识储备,也无法完全消除“非常”现实对个体情绪的磨损。因此,微观层面的心理调适变得至关重要。在这里,革命者的幽默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日记中,童小鹏善于以诙谐的笔触化解现实的沉重:队伍途经地名“杀人场”,他评之为“笑死人的地名”<sup>[1]797</sup>;草地宿营,他分到一个破棚容身,“地湿又不平,棚小又过矮,的确转身都转不得”,却自嘲“在这种环境下说来还是一个上等货呢!”<sup>[1]821</sup>队伍进入藏区,他见路上桥梁完好,又戏言:“如果这两座桥被破坏了的话,真的只有请你向后转。”<sup>[1]825</sup>赵镛同样展现出相似的幽默感。一日,队伍露宿老界山顶,清晨,哨兵高喊“同志们起床了”,他暗自好笑:“这大山顶上哪里有床噢!”<sup>[9]180</sup>他者的鼓励同样提供了重要支撑,戴镜元<sup>⑥</sup>记录了另一种形式的幽默:当队伍行进在无水无风、烈日当空的荒山上时,有的同志大谈曹操的“望梅止渴”,还有人戏称此为“火焰山”,在这般说笑之间,战士们“一口气爬过了这座热气蒸人的荒山”<sup>[29]</sup>。

尽管情绪调适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心理负担,但其作用毕竟是浅层和瞬时的。行动唯有指向

⑤ 《陈行庚关于长征的报告》,1959年8月10日,A023-002-01405-0086,上海市档案馆藏。陈行庚(1914—2011),湖北黄安人,长征时任红四军通信员。

⑥ 戴镜元(1919—2008),福建永定人,长征时期担任中央军委二局党支部书记。

一个超越“日常”的宏大目标,才能获得终极意义。董必武<sup>①</sup>曾这样回顾:

我在出发前,虽发生过随军去或留后方的问题。可是红军主力向什么地方移转呢?经过什么地方呢?路有多远呢?这类的问题,没有发生过,也没有听见别人谈过。当时为什么不发生这些问题?这因为红军是要北上抗日的,当时在北面和东面,敌人重重叠叠的筑满了乌龟壳,大部队通过较困难。西边的乌龟壳要稀落些,主力转移地位自然是由西向北前进,这是毫无疑问的……只要大的方向知道了,其余的也就可以不问。<sup>[30]</sup>

“北上抗日”的口号,为行军提供了一个心理上的“尽头”。任何与之背离的军事行动,都足以引发基层指战员的困惑与焦虑。1935年3月,一位警卫班长向萧锋坦言:“一天走个百儿八十里路是小事,但转圈子受不了,一下东,一下西,像梭子似的,哪有头?北上抗日什么时候到?”<sup>[17]58</sup>周仁文<sup>②</sup>回忆,“草地分兵”之际,红四军部队又南下,战士们弄不清是咋回事,反应很强烈,纷纷议论:“打着北上抗日的口号,走了这么远的路,怎么突然又变了。”<sup>③</sup>至1936年4月,中央红军北上成功的消息传来时,红四军供给学校的学员们仍在议论:“形势既然如此严重,我们为何还不北上抗日呢?”<sup>[9]450-451</sup>尽管行军路线时有迂回曲折,“北上抗日”作为终点,始终是战士审视具体军事行动的标尺。

“北上抗日”这一目标的感召力,不仅源于其作为政治口号的崇高性,更在于它在红军与群众的日常互动中获得了持续验证。每到一处,战士通过细微之举,赢得群众的信任与拥护。当战士们发现自己的善举能够换来“红军先生”的尊称和真诚帮助时,便获得了强烈的正向激励。通道县的案例生动体现了这一点:红军在杨光斌家食用猪肉后,因主人躲避,战士们想了个巧妙的办法,将猪头藏在铺草堆中,铜钱又藏在猪嘴里<sup>④</sup>。此举既确保了钱款安全,又以一种公平的方式成交了买卖,在严肃的纪律中透出灵活与真诚。事实上,战士个体未必具有更高的道德自觉,这更多是一种在制度约束中逐渐形成的行为模式。刘芬德回忆,留在他家中的战士朱云章时常说:“国民党说红军不好,说红军来了杀人,剜肚皮等。你看我们来了,有这样的事吗?”<sup>⑤</sup>该战士掉队时仅13岁,对于一个心智尚在成长的少年而言,这种鲜明的身份认同,必然源于行军实践的潜移默化。

当然,如陈仲山般主要受外部因素驱动,未能形成内在信念认同者,在长征队伍中不在少数,因此上述措施难以彻底解决人心动摇和掉队问题。然而,时间久了,信念终究得以在部分战士心中扎下根来。在他们看来,行军已不能简单理解为一场被动的艰苦跋涉,而是一种具有明确方向与必要性的远征。童小鹏的日记清晰地反映出这种心态:1935年7月,在部队休整十余天后,当得知次日可能出发时,他并未感到疲惫,反而因“休息太久”而产生“烦闷”,并将出发视作“如休息一样的喜悦”。随着出发日期一再推迟,他表现出“等得有点不耐烦”的急切;待到最终成行时,更由衷感叹“的确喜出望外”<sup>[1]816</sup>。从“渴望休息”到“期待出发”的转变,意味着行军在他心中已不再是身体负担,而是实现革命目标不可或缺的实践途径。这种信念的产生,同样表现在他1935年的“年终总结”中:“社会是进步着,革命的形势更加急速的迈进着……同伴们已经到前面去了,落后的我,懦弱的我,步着后尘去赶吧!”<sup>[1]843</sup>作为时代洪流中一名个体的自我鞭策,这段日记清楚地表明,在部分战士心中,长征确已内化为一种顺应历史大势的自觉行动。

① 董必武(1886—1975),湖北黄安人,长征时任干部休养连党总支书记、妇女队队长。

② 从回忆内容看,周仁文应该是长征时期红四军的一名战士。

③ 周仁文《回忆北上抗日的的生活片断》,中共武威地委党史办《血沃凉州:中共武威地区党史资料选编》,内部资料1991年编印,第452页。

④ 杨光斌(湖南省通道县流源小学教师)的口述材料,《红军长征纪实丛书:沿途亲历者忆长征卷(1)》,第44—45页。

⑤ 《中共黔东南自治州委员会办公室红军长征资料》,剑河部分第9页,无编号,黔东南州档案馆藏。

## 余论

面对着长征行军的“非常”状态,红军通过构建并维系日常秩序,保持组织有序运转,从而实现战略转移的最后成功。这一在“非常”中建立“日常”的过程,既是红军应对极端环境的生存策略,也是其组织韧性与政治信念的一种体现。漫长的行军塑造了“非常”中每一名个体的日常生活,在这些日常细节中,既能目睹“非常”下的严酷现实,也能观察到时代洪流中个体不定的命运。但是,作为历史主体,他们并不是被动地承受苦难,而是主动地寻求出路。也正是这些个体的坚持和适应,支撑着队伍走出“非常”,走进延安的新的“日常”。

从红军的行军生活中可以看到,与常规军队组织建设中的“培养”模式不同,红军在长征中的组织运转本质上是一种“筛选”模式。其中固然包含了无数偶然、即时决策和无奈之举,但其最终呈现的逻辑亦相对清晰,即在持续流动中实现整体存续。在人员层面,红军通过“收容”挽救掉队边缘者,通过“扩红”不断补充新血液,在动态中保持人员稳定,其重视的始终是“总有人能跟上”,而不苛求一个不掉队;在物资保障方面,红军发展出的也不是稳定的后勤供应体系,而是一套高度依赖外部的流动补给模式,其通过“打土豪”获取给养,利用缴获物资维持运转,关键时果断轻装前进,其核心在于“总能找到资源”,而非建立持久储备;甚至在信念维系上,红军也展现出类似的务实态度,不寄望于所有战士都具备坚定的革命意志,而是通过日常工作不断育成核心骨干,使这支队伍在损耗中依然保持必要的凝聚力。长征的真正胜利,不在于无人离开,而在于总有人选择留下并继续前进。这种“在持续的变化中建立秩序,在不断的更替中保持延续”的组织模式,正是红军在行军中形成的独特生存智慧。

当然,“红军”其实也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这支“大进大出”的队伍,其内部的行军生活实践,根据所在时空和群体的不同,仍会呈现明显差异。伤病、掉队和扩红的实情,在不同行军阶段与不同队伍中难以一概而论;物资补给从“打土豪”到“筹措”,再到极端条件下的自力更生,其具体执行随地域不同存在显著变化;遑论士兵的体魄、心理与信念,更因所处环境、部队状况乃至个人经历而截然不同。本文所呈现的,仅是这部复杂历史图景中最普遍与基础的侧面,是“最日常的日常”,无意也无法穷尽所有细节。以上这些未被充分讨论的差异性,以及有待深入发掘的史料,则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可能的方向。

### 参考文献:

- [1] 童小鹏. 军中日记[M]//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红军长征纪实丛书:日记卷(2).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
- [2] 李德. 中国纪事[M].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
- [3] 何涤宙. 遵义日记[M]//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327.
- [4] 王集成. 智取遵义[M]//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回忆史料(1).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6:199.
- [5] 陈国辉. 活跃在长征路上的党小组[M]//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回忆史料(3).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
- [6] 王耀南. 坎坷的路[M]. 北京:战士出版社,1983.
- [7] 张子意. 张子意日记[M]//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红军长征纪实丛书:日记卷(3).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1238.
- [8] 张震. 艰苦卓绝长征路[M]//卜金宝. 口述长征. 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7:11.
- [9] 赵镛. 长征日记[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
- [10] 莫休. 一天:再占遵义城[M]//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 [11] 裴周五. 踏上艰难的征途[M]//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回忆史料(1).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6.
- [12] 廖汉生. 长征路上的生命线[M]//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回忆史料(4).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6.
- [13] 林伯渠. 林伯渠日记[M]//中共党史资料(64).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
- [14] 金震宇. 红军长征两过桐梓见闻[M]//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红军长征纪实丛书:沿途亲历者忆长征卷(1).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142.
- [15] 陈伯钧日记[M]//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红军长征纪实丛书:日记卷(1).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
- [16] 林伟. 一位老红军的长征日记[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120.
- [17] 萧锋. 长征日记[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 [18] 李坚真. 李坚真回忆录[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 [19] 彭绍辉. 彭绍辉日记[M]//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红军长征纪实丛书:日记卷(1).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
- [20] 聂荣臻. 聂荣臻回忆录[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186.
- [21] 李小侠. 我的回忆[M]//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红军长征纪实丛书:沿途亲历者忆长征卷(1).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120.
- [22] 薄复礼. 一个外国传教士眼中的长征[M]. 张国琦,译. 北京:昆仑出版社,2006.
- [23] 小鹏. 粤汉路旁[M]//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252.
- [24] 加伦. 胜利后的一幕[M]//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210.
- [25] 伍云甫. 伍云甫日记[M]//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红军长征纪实丛书:日记卷(2).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
- [26] 颜金生. 草地记事[M]//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回忆史料(4).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6:203.
- [27] 梦秋. 随军西行见闻录:第八路军红军时代长征史实[M]. 上海:生活出版社,1938:64.
- [28] 刘瑞龙. 难忘的征程[M]//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回忆史料(3).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6:186.
- [29] 戴镜元. 长征回忆:从中央苏区到陕北革命根据地[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60:52.
- [30] 必武. 出发前[M]//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185-186.

## The everyday in the extraordinary: The marching life and organizational operations of the Red Army's Long March

Chen Sitan

(School of Humaniti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P. R. China)

**Abstract:** The daily life of the Red Army during the Long March was a process of establishing and sustaining a sense of normality amid an extraordinary historical period. Confronted with immense challenges, the Red Army externally faced continuous enemy encirclement and extreme natural conditions, while internally it had to overcome material shortages, injuries, illnesses, and ideological wavering.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ersonnel metabolism, resource procurement, and ideological cultivation, the Red Army strived to develop and implement a set of operable and sustainable daily management mechanisms under conditions of constant mobility and high instability. This mechanism became a crucial support for maintaining organizational functioning in extreme circumstances and offers an interpre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aily life history, of the inner vitalit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revolutionary organization.

**Key words:** the Red Army; Long March; marching; everyday life

(责任编辑 周沫)